

济南开埠与对德国文明的“观摩受益”

王守中

(山东师范大学, 山东 济南 250014)

摘要: 1902年, 山东巡抚周馥访问青岛, 受到德国人经营理念的启发, 提出了一项与德国人“相维相制, 而因以观摩受益”的新政策, 有力地促进了济南的改革与开放, 成为清末济南向现代化起步的一块里程碑。虽然当时济南的改革环境并不好, 但短短十年的改革开放, 却取得了相当的成就, 成为济南有史以来制度创新最多, 政治变化最大, 经济、教育发展最快的时期之一。

关键词: 观摩受益; 改革开放; 理性竞争; 发展; 现代化

中国分类号: K257.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7110(2012)01-0108-06

在清末新政实行改革开放的过程中, 1904年济南被辟为开放城市, 成为该城市向现代化起步的一块里程碑。济南的开放, 固然缘起于清政府有关开放通商口岸的指示, 但从山东地方官表露的思想看, 无疑也是受了德国人经营青岛的启发, 有对德国文明“观摩受益”的成分。本文对此略作讨论。

一、“观摩受益”的历史背景

“中国是农业文明的创造者, 工业文明的落伍者”。所谓现代化(指第一次现代化), 就是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化。从中外历史实际看, 中国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化的具体含义, 应当包括以下四点: 1, 经济上, 是由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化; 2, 政治上, 是由集权专制向民主制转化; 3, 文化上, 是由纲常伦理型向自由、平等、科学型转化; 4, 社会生活, 是由农村向城市转化(即城市化)。这是近代中国发展的根本方向, 也是我们评价近代中国一切人和事的根本标准。

众所周知, 人类的工业文明发端于18世纪的英国, 很快遍及欧美。亚洲的日本发现了西方工业文明的优长后, 决心“脱亚入欧”, 急起直追, 很快也转向了现代化。而中国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化, 却经历了一个十分艰难而痛苦的过程, 直

到现在仍然没有完全实现工业化。

在近代史开始的时候, 中国和日本, 处在大体相同的发展阶段和环境中, 可是据2007年和2010年的《中国现代化报告》评估, 世界上包括日本在内, 已有29个国家进入了第二次现代化, 而中国要达到发达国家水平, “预计要到21世纪末”。在实现现代化方面, 中国与日本的差距何以会如此之大? 原因是多方面的, 其中最重要的一点, 是中国人的保守性, 不肯学习西学所致。对此, 我们且不说历史上先进的中国人是如何批评的, 就是主张以“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的张之洞, 对中国人不肯学习西学的态度, 也有中肯的评说。例如, 1898年4月, 张之洞在其著名的《劝学篇》中说, “今日五洲大通”时代, 中国的旧法、旧学, 已经“相形而见绌”, 要富强, 必须大力学习西学, 可是中国人和日本人, 在这方面却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态度。他指出: “日本, 小国耳, 何兴之暴也? 伊藤、山县、榎本、陆奥诸人皆二十年前出洋之学生也, 愤其国为西洋所胁, 率其徒百余人分诣德、法、英诸国, 或学政治、工商, 或学水路兵法, 学成而归, 用为将相, 政事一变, 雄视东方。”而华人对于西学, 则“不肯殚心力以求之”, “陋儒俗吏”, 甚至“动以新学为诟病, 相戒不学”。“若循此不改, 西智益智, 中愚益

收稿日期: 2011-10-26

作者简介: 王守中(1934-), 男, 山东寿光人, 山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历史文化学院退休教授, 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

愚,不待有吞噬之忧,即相忍相持、通商如故,而失利损权,得粗遗精,将冥冥之中,举中国之民已尽为西人所役矣;役之不已,吸之、朘之不已,则其究必归于吞噬而后快。”因此,张之洞大声疾呼派游学,设学堂,广译西书等等,以培养有用之人才,挽救国家的危亡。^[1](外篇·益智第一)

然而,张之洞的呼吁,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特别是慈禧发动戊戌政变以后,顽固派得势,更掀起了一股仇视外人、反对西学的高潮,他们甚至孤注一掷,利用义和团对外宣战,结果惹来了八国联军之大祸,直将中国闹得“国将不国”,遭遇了第一次“被开除球籍”的危险!直到这时,中国的统治者才发现,再也无法照老样子统治下去了,不得不于1901年初,自上而下发动了一场全方位的新政改革,将中国的现代化,第一次比较全面地提上了实践日程。^[2]

同全国的情况一样,十九世纪下半叶任职于山东的最高行政长官,除丁宝楨和张耀两人多少办过一点新事业外,其余任职的十多位巡抚,都少有改革的举措。尤其在19世纪末年李秉衡、毓贤任巡抚时期,他们在外力入侵山东最严重的年代,虽都表现了激烈反对外国侵略的情绪,但其出发点,在很大程度上却是为了维护旧传统,对抗西方工业文明。以往在北洋大臣李鸿章支持下开办的枣庄煤矿,以及平度、招远等地的金矿,1895年后被李秉衡封闭,就是明显的证明。同时,李秉衡和毓贤,又大肆庇护、纵容大刀会、义和团,梦想要把一切洋人、洋教、洋学、洋物逐出中国,再恢复到闭关自守的时代,去过“大清一统庆升平”的日子。这是一种严重反现代化的守旧行为。正如清政府督办政务处的开办章程所说:守旧之极而有拳匪之乱,朝廷不得安宁,也触犯了海内外人心,为各国所讥笑,亦是中国之耻辱。该章程还指出:“中国之弱由于贫,列国之强由于富”,因此,中国要富强,必须以改变贫穷为基础^[3](27卷P10)。正是出于这种新认识,中国的当政者们抛弃了以前的守旧路线,都投入到了新的改革中去。

山东第一位具有全面改革思想的巡抚是袁世凯,他在镇压了义和团以后,一面连续上书力谏慈禧太后实行新政,一面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进行改革。袁从1899年12月至1901年11月,总共在济南待了两年时间,首先用一年多时间全力对付义和团及收拾善后,然后才腾出时间和精力来进行改革。他很快就在济南创设了一所教养

局和一个工艺局;创办了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所省办新式大学堂,被清政府当作样板向为全国推广;创设了新式机关山东省商务局,并号召各地商人组织商会,以图官商联为一气,振兴工商实业。此外,袁世凯还计划改革教育、开办银行、创办报纸,以及练新军、办巡警等等,虽然没有来得及全部实现,但却深深地影响了后来的山东地方官,使他们实心实力地投入到了改革中去,因而迫切需要学习、借鉴外国的先进成果和经验。

恰在这时,1897年强行占领中国领土青岛的德国侵略者,对中国的政策也有了改变。他们鉴于以前的侵略行为,遭到了山东官绅士民的激烈反抗,也深刻认识到,要想在山东发展德国的实力,获得殖民事业的成功,必须同山东当局和人民保持一种良好的和平关系。1902年,德国青岛当局派出高级代表团访问了济南,表示“和睦友好”;1904年胶济铁路全线通车时,德皇威廉二世还向周馥赠送了一颗金冕头等宝星,表彰山东巡抚“和衷保护铁路之功”,清廷也赏给了德国胶济铁路总监工一颗二等第三宝星^[4](P272-278)。这说明,为了各自的利益,双方都愿意寻求和平与合作,从而为山东地方官学习借鉴德国的文明成果提供了有利条件。

二、“观摩受益”政策的提出

因为改革的需要,缺乏现代化知识和经验的山东地方官,对德国人也采取了一项“观摩受益”的新政策。这是巡抚周馥1902年访问青岛后提出的,因此,该项政策的确定,与德国人经营青岛的成就有着密切关系。

青岛本来只是几个不大的渔村,1897年德国占领以后,以其雄厚的资金、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理念,十几年间在该地建起了一座现代化的城市,这既使人们羡慕不已,同时也给落后的中国提供了借鉴的榜样。1902年12月7日,周馥巡抚访问青岛时,尽管当时青岛的建设才刚刚起步,中外商人也不多,买卖亦不畅旺,但德国人在青岛的建设和发展规划,却给周馥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在向朝廷的报告中说:德国人在青岛“经营不已,土木之工,日数千人,洋楼大小几及百座,修街平道,种树引泉,以及电灯、自来水、机器厂等工,德国岁拨银三、四百万两。此外,建筑码头,修造船坞、炮台,闻估工需一千数百万两,大约三、五年后始能粗备。窥其意旨,以振兴商务、开采矿产为本,而以笼络中国官商为用,深谋远虑,愿力极宏,在我视为租界,在彼已视若属地,华民寓居界内

者,彼援条约原文,归彼治理,难以辩驳,此时万无抗拒之理。惟有讲求工商诸务,通功易事,与之相维相制,而因以观摩受益。”为防止莠民滋事,“外固邦交,以联情谊”,他还选派明白干练官员,维持租界以外和胶济铁路的治安^{[5] (P140-141)}。周馥的报告,一方面流露了对德国人建设青岛宏伟规划的钦佩之情,另一方面提出了与德国人“相维相制”和“观摩受益”的政策。

所谓“相维相制”,就是与德国人维持和平局面,通过发展内地经济来与德国人经营的青岛相竞争,限制德国人的利益;所谓“观摩受益”,就是通过观察、学习、借鉴德国人的经营理念和经验,从中受到启发和得到益处。此项政策的提出,反映了清末的中国官员们,彻底抛弃了以前盲目排外的极端思想和行为,而用理性竞争的精神,来推动中国的现代化。所以,尽管清朝末年山东地方官更换频繁,但都维持该项政策不变,并为此做了努力。

三、“观摩受益”政策在济南的实施

周馥访问青岛是个开头,后来杨士骧、袁树勋、孙宝琦等几位巡抚,也先后到青岛参观访问,德国人建设青岛的成就,都给他们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如1907年4月,杨士骧访问青岛后向朝廷报告说:本年二月间(3月),驻青岛德国提督都沛禄来省拜晤,“词气备极歉婉,此次赴青岛答拜,彼亦优礼接待,益征辑睦。臣留心查看该处情形,其近日办事,义(益)主和平,注重商务;驻界守兵,仅足自卫;市缠房屋,兴盛日臻;中外商民,亦均和洽。”他经过租借地内外地方,看到“市集渐盛,生计日裕”,附近居民“咸知铁路交通之利,并无外族逼处之嫌”。因此他同周馥一样,也提出了“内地商务,亟待扩张”的主张,以与德国人相竞争,挽回部分损失的利权。^{[5] (P150-151)}

在山东巡抚积极发展内地工商业经济的各项措施中,1904年5月1日,周馥和北洋大臣袁世凯,联名奏请将济南辟为开放城市,是其中最重要的措施之一。

济南的开放,虽缘起于清政府开放通商口岸的有关指示,但从山东地方官表露的思想看,无疑也是受了德国人经营青岛的刺激,因而在济南开放的有关报告和章程中,明显地流露了与德国人“相维相制”和“观摩受益”的思想。

首先,济南等城市的开放,可以说是不失时机地利用了德国人修筑青岛港和胶济铁路的有利条件。周馥、袁世凯在《山东内地铁路畅行拟请添开商埠折》中称:自1898年德国租借胶州湾以后,“青岛建筑码头,兴造铁路,现已通至省城,转瞬开办津镇铁路^①,将与胶济之路相接。济南本为黄河、小清河码头,现又为两路枢纽,地势扼要,商货运输较为便利”,因此拟在“济南城外自开通商口岸,以期中外商民咸受利益。”省城以东之潍县和长山县所属之周村皆为商贾荟萃之区。“该两处又为胶济铁路必经之道,胶关进口洋货,济南出口土货,必皆经由于此。拟将潍县、周村一并开作商埠,作为济南分关。”^{[6] (P929-930)}虽因经费不足,潍县、周村商埠未能开发建设,但官员们利用德国人修筑青岛港和胶济铁路的机遇,及时开放有关城市以发展经济的愿望,是值得称道的。

其次,德国虽把青岛作为它在远东的军事根据地,但其殖民当局一直认为,“对这一地区的未来具有决定意义的是:首先把它发展为一个商业殖民地,即发展成为德国商团在东亚开发广阔销售市场的重要基地。”因此,他们在一切行政措施中,总是把发展该地之经济放在首位,强调对工商业不要管得太严,实行关税自由和原则上的经营自由,尽力招徕各国工商界人士到青岛经营工商业^{[7] (“译稿”)}。所以周馥和杨士骧,都看到德国人在青岛“振兴商务”或“注重商务”的事实。因此周馥特在济南城西、胶济铁路以南,划出4000多亩土地作为商埠(借用现在的名词就是“经济开发区”),“准有约各国在该处设照料商务之官员,准各国商民任便租地设栈,与华商一体居住贸易”。官员们还制定了暂不收税收捐的政策,所有马路、巡警、路灯、洒扫所需费用,均有华官自行筹备(F, 1088),以吸引中外商人到济南投资。

第三,济南商埠的规划,是聘请德国人设计的^{[8] (附录 P104)},所以在土地政策和城市建设方面,与青岛有某些相似之处。例如,在土地政策方面,青岛市区和济南商埠区的土地,都由政府实行垄断和广泛控制。首先由政府将所用土地统一收买,不准民间私自买卖;然后按照城市建设规划图,留足公用土地后,将其余土地转让给土地使用者。其转让办法,青岛是将土地拍卖,济南则参照湖南岳州府开埠章程,只出租不出卖。买主或租主,须

^①津浦铁路原拟由天津通往镇江,故先称津镇铁路。

呈报土地使用计划并限期利用。这种土地政策,既防止了给城市发展造成恶果的土地投机,也把城市建设纳入了有序之中。在城市建设方面,青岛和济南商埠区事先都绘制了平面规划图,并由国家拨款进行了马路、排水系统等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这样既使城市建设有合理的布局,同时也为工商界人士创造了良好的投资环境。

第四,为了进一步改善济南的交通,山东地方当局在开放济南的同时,亦筹款重新疏浚了小清河,商人唐荣浩组织了小清河轮船公司,购置浅水轮船,往来于济南、羊角沟、烟台、天津等处^{[9](P284)}。这一举措,挽回了部分德国人垄断胶济铁路之利。

第五,由于不平等条约的束缚,中国丧失了青岛的主权,因此,周馥和袁世凯在《济南城外自开商埠先拟开办章程折》中特别强调:这个自行开办的通商口岸,与条约开放的各口岸不同,它的主权应完全由中国掌握,其行政、司法、巡警、建筑、工程等事,均由山东巡抚派官监督^{[6](P1086-1087)}。在稍后制定的《济南商埠组建章程》中,官员们又进一步强调:“一切事权,皆归中国自理,外人不得干预。”^{[10](213-216)}因为当时干涉山东地方官施政的只有德国人,因而官员们的上述言论和规定,显然有防止德国人干涉内政和主权的用意。

清末山东地方官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彻底放下了以往那种使人讨厌的愚昧无知、傲慢自大的臭架子,虚心观摩借鉴德国人经营青岛的先进经验,从中得到益处,并处处彰显与德国人理性竞争的精神,不能不说这是一种觉醒的表现。所以直到今天,人们还念念不忘济南现代化起步的这段历史!

四、清末民初青岛和济南的发展

1900年以后,山东地方官实行开放政策,试图通过发展内地的工商业,以及鼓励土产品出口等,来抵制德国人对青岛的经营。但事实上,内地经济的发展和济南等城市的开放,不仅对青岛无抵制作用,相反,更促进了青岛的发展与繁荣。这是因为:第一,内地商品经济的发展,扩大了土产品的出口,同时也提高了人民购买外国商品的能力;第二,内地兴办工厂等,需要购买外国的机器设备;第三,济南等城市的开放,便利了外商到内地推销商品和采购土产品出口。这些都是促进青岛发展的重要因素。

青岛是在德国侵占下兴建的一座商业殖民地

城市。德国海军殖民当局为了显示其经营殖民地的能力,并不亚于老牌的大不列颠,还决心把它建设成为“模范殖民地”,因而对市区的街道、房屋建筑、游乐场所、电灯、自来水,以及雨水、污水排泄、植树造林等,都规划得极为细密,尤其注重卫生、交通、坚固、防火诸端,并发布一系列法令保证执行,短短十几年,就把青岛建成了亚洲一流的现代化城市。1916年,一位中华革命党人由上海到青岛旅游,曾称赞青岛的建筑是“崇实除华,返纯还朴。日本之东京、长崎、横滨等处,其清洁仿佛似之,而无其庄严,无其纯朴,其坚固更无论矣。至于吾国之上海,视之殆东施之与西施耳。”^{[11](2卷3号)}这些描述,确实反映了青岛建设的特点。

由于青岛具有当时亚洲最先进的港口设施,又有铁路与内地相通,加之山东实行开放政策和内地经济的发展,使青岛的贸易发展迅速。1901年,青岛的进出口贸易总额为8731千两,1913年增加到59619千两,13年增长了5.8倍。其中洋货进口由3430千两,增长到26467千两,增长了6.7倍;土货出口由2762千两,增长到25692千两,增长了8.3倍^{[12](P10-11表2)}。随着贸易的发展,德国、英国、日本、美国、俄国等国的轮船公司,先后开辟了青岛与上海、香港、烟台、天津、大连、海参崴、神户、长崎以至欧洲的定期航线,加强了青岛乃至山东与世界市场的联系。因而,各国商人纷纷云集,青岛的人口迅速增加。据德国人调查,1897年,整个租借地的人口为83000人,1913年7月增加到189411人,增长了1.28倍。内中,青岛城区增加得尤快,1902年为15671人,1913年7月增加到55723人,增长了2.6倍。青岛城区1913年的人口中,有中国人53312人,德国人1855人(不含2200多人的驻军),日本人316人,其他各国2411人。^{[4](P132-138)}青岛的中国人,一部分从事小本经营的商业店铺和手工制造,一部分从事苦力劳动。青岛大的工商企业,都掌握在外国人手中。其中有德国殖民当局官办的造船厂、发电厂、自来水厂、屠宰厂等,也有私人企业家开办的银行、啤酒厂、缫丝厂、砖瓦厂、汽水厂、蛋品加工厂等。但更多的是与贸易有关的各种商行,如从事输出入贸易、船舶和保险业的礼和、瑞记、美最时、哈利、禅臣等洋行,从事电器营销的西门子公司等。此外还有从事建筑业的贝泥格公司和广包公司等。至1913年,德国人在青岛开设的较大私人企业共有27家。青岛的日本人,起初多是开设小店铺的商

人,但自1907年始,三井、正金、汤浅、日信、江商、大文、盘城等大企业相继在青岛开设支店后,逐渐掌握了贸易主动权,使青、日间的贸易,自1912年起,超过了德国而占了第一位。美国的石油公司、英国的贸易商和汇丰银行、俄国的商人等,也陆续落户青岛,因而美、英、俄三国,先后在青岛设立了领事馆。

青岛不仅是一个商港,也是一处天然的避暑胜地。它那明媚的风光,温和的气候,各种游乐场所和赛会,以及各国风味的旅馆饭店,再加殖民当局的多种招徕措施,吸引各国人士前来避暑观光,使青岛日益成为国际知名的旅游城市。

济南是一个古老的传统城市,自明朝以来,又成了全省的政治文化中心,这里集中了比全省任何其他城市都多的官吏和文人,使它受重义轻利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较深,成为中国最保守的城市之一。但1900年以后,山东地方官的改革,均以济南为基地展开,因而使它一跃而成了领导全省改革的中心。前面我们已经简要介绍了袁世凯在济南推行的改革和影响。此后1902年和1903年,周馥又在济南建立了警察制度和街道清扫制度,设立了省农桑总会,开办了农事实验场,改良推广农业和植树造林等。但对济南发展最具决定意义的,是1904年实行的开放政策,允许外商进入济南,从而成为济南发展史上的一块里程碑。到1913年,陆续在济南落户的外国商行中,其重要者,有德国的德华银行、礼和、哈利、瑞记、美最时、捷成、禅臣、礼丰、义利、万顺等公司或分店;日本的有三井、汤浅、大仓、大文、日华、日中、山玉、东亚、正金支店,以及一家金水旅馆。此外,还有法国人开设的两家商店,以及英美烟草公司和亚细亚石油公司等。这些商行,除少数从事旅馆、饭店及杂货贩卖外,绝大多数都是搞输入贸易的。中国商人开设的贸易商行,较大的有周瑞记、天成、复成、立成、北意成、协成春、天祥永、公聚和、益祥、龙聚兴、源聚号、大昌号、长兴和、恒聚泰等14家。官办事业有大清银行(民元后改为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等。各国商人从青岛输入济南的外国商品,以棉纱、棉布、砂糖、火柴、杂货为主。1913年从济南输出的重要土产品,有棉花7万担,草帽辫6万担,花生70万担,花生油20万斤,牛皮200万张,牛骨100万斤,牛油5千担,麻500万斤等。济南贸易的发展,显示了一个内陆商业城市日益增长的重要作用。随着各国商人的增加,

德国、日本、英国先后在济南设立了领事馆。

济南的工业,均为中国人所创办。到1913年,济南重要的工厂有12家。其中官办的有山东机器局、教养局和工艺局3家。私人企业家创设的有济南电灯公司、乐源造纸厂、振业火柴公司、岱北模范染织有限公司、兴华染织厂、兴顺福机器榨油厂、人和面粉公司、云锦织布厂、三义工厂等9家^{[8](附录P101-104)}。除3家官办工厂设于1904年以前外,其余9家私办企业,都是济南开放以后建立的。

随着经济的发展,济南的人口迅速增加。1909年调查,有62174户,245978人,其中老城区126748人,商埠区11159人,乡区108071人。到1911年,整个市区增到69000户,275300人^{[13](P8)},两年增加近7000户,29322人。济南是山东人口最多的城市,而青岛则是山东最现代化的城市。

五、清末济南的教育和政治体制改革

以上我们着重介绍了济南的开埠和经济发展情况。事实上,清末济南的改革开放,决不仅仅表现在有限的经济发展方面,教育和政治体制等方面的改革及成就,也是济南由传统向现代化转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中国搞现代化建设,最大的困难有两个:一是缺资金,二是缺人才;而求人才更难于筹资金。因为中国传统文化没有科学,要培养人才,必须大力引进西学,因而清末新政的开场戏就是教育改革,通过废科举、兴学堂,派留学三大措施,用新知识来培养人才。当时,山东同全国一样,被甲午战争、八国联军战争两次大赔款搞得一贫如洗,但当局依然不惜资金大办新式学堂。除袁世凯创办的山东大学堂(不久改为山东高等专门学堂)外,短短十年间,又先后在济南创设了多所其他专门学堂,诸如山东高等师范学堂、山东公立法政专门学堂、山东公立工业专门学堂、山东公立商业专门学堂(清末的各种学堂,民国后一律改称学校)等。此外,济南还有一些私立的中等专门学校,如第一法政专门学校、私立法律学校、私立山左法政学校、私立法政学社、私立海右师范学校、私立师范讲习所等。公立、私立的普通中小学亦陆续建立。新式学堂中所传授的知识,西学占了70%以上。尤可注意者,是女子学校的兴办,除普通女子小学外,还有女子师范学校、保姆养成所,女子蚕业讲习所等专门学校的兴办,虽然数量不多,但却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给了

妇女以正式受教育的权利,对后来提高妇女的地位,推动女权运动的发展,产生了不可低估的作用。此外,还有德国人开办的德文高等学堂,后改为济南外国语专门学校,并附设中学;英美基督教亦有医道学堂等。^{[8] (附录 P97-98)}

现代科学知识,早在明末清初就由西方传教士开始介绍到中国来,后来洋务运动中创设的学校和翻译机构,以及传教士在中国开办的大中学校 and 报刊等,都向中国介绍了一些西学,但由于中国的学术被科举制度牢牢统治,西学始终没能在中国扎根。清末改革,将西学正式纳入教育机制,才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的知识结构,为发展现代化提供了必备条件。

为了弥补国内办学之不足,在清政府号召下,山东当局从1903年起开始派遣留学生,至1909年,先后共派出官费留学生190人,其中多数是从设在济南的高等学堂、师范学堂等派出的。这些人初以学师范的居多,后来扩展到工、商、农、铁路、矿物、医药、化学、绘画、音乐等众多领域。官费留学开风气之先,引起了私费留学之兴趣,从1905年起,山东的私费留学亦渐成气候。留学生人数虽不算多,“但由于他们造诣较深,识见较广,特别是在海外自由地接触了立宪运动和革命运动,他们回省或回国后,不仅带来了新技艺,也带来了新思想,这对山东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必然会发生不同广度和深度的影响。”^{[14] (P407-409)}

清末的政治体制改革也取得了相当进展。依照清政府的计划,1909年5、6月间,山东举行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次直接选举,根据人口比例,全省选出了103名议员,成立了省级民意机构咨议局,并于当年10月在省城济南召开会议,按照民主程序议决了部分有价值的议案,对省政府实行了监督。除省级机构外,1910-1911年间,山东的州县自治,从历城县开始,选举民意机构议事会及参事会议员,至1911年10月,全省成立两会者达70州县,其中济南府所属16州县全部完成^{[14] (P280-284)}。民选议员及民意机构的成立,打破了封建大一统的绝对权力,推动社会沿着民主轨道前进。

同时,按照清政府《钦定行政纲目》的规定,我国实行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原则。山东当局

于1910年1月,在济南设立高等、地方(州县级)、初级审判厅各一所,商埠设初级审判厅一所^{[14] (P282)},这标志了我国自古以来行政、司法合一体制的终结。

就实际情况而论,清末济南改革的环境并不好,财政困难,人民穷困,苛捐杂税,民不聊生,社会动荡,如此等等。然而,短短十年的改革开放,却取得了相当的成就,成为济南有史以来制度创新最多,政治变化最大,经济文化发展最快的时期之一。台湾学者张玉法教授认为:“1911以后的几年,虽然进入共和时代,一切的政治变化,大体仍以前此十年间的变化为基础。”^{[14] (P285)}

清末新政改革开放的实践,给我们留下了无尽的思考!

参考文献:

- [1] 张之洞. 劝学篇 [M].
- [2] 王守中. 清末新政与中国现代化 [N]. 联合日报, 2009-07-04.
- [3] 沈桐生辑. 光绪政要 [Z]. 宣统元年上海崇义堂刻本.
- [4] 王守中. 德国侵略山东史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8.
- [5] 山东省历史学会编. 山东近代史资料: 第三分册 [Z].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61.
- [6] 天津图书馆、天津社科院历史所编. 袁世凯奏议 [M].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 1987.
- [7] 胶州总督府. 胶州地区发展备忘录 1902.10—1903.9 [Z].
- [8] 田原天南. 胶州湾 [M]. 大连: 满洲日日新闻社, 大正三年.
- [9] 王守中、郭大松. 近代山东城市变迁史 [M].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2001.
- [10] 济南市房产管理局编志办公室编. 济南市房地产志资料: 第一辑 [Z]. 1983年刊.
- [11] 淮阴钓叟. 青岛茹痛记 [J]. 新青年, 第2卷3号.
- [12] 烟台港务管理局编. 近代山东沿海通商口岸贸易统计资料 [Z]. 对外贸易教育局出版社, 1986. 此处所用数字以千海关两为单位, 千以下四舍五入.
- [13] 实业部国际贸易局. 中国实业志·山东省: 第四编(丁) [M].
- [14] 张玉法. 中国现代化区域研究·山东省(1860—1916) [M]. 台北: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 1982.

责任编辑: 侯德彤
(下转第126页)

[24] 钱钟书研究编辑委员会. 钱钟书研究第2辑 [M]. 北京市: 文化艺术出版社, 1990.

[25] 钱锺书. 谈艺录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4.

[26] 钱钟书. 钱钟书散文 [M].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1997.

[27] 王绍曾. 钱子泉先生讲学杂忆 [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纪念钱基博先生诞辰百周年专辑, 1987:127.

[28] 钱锺书. 走向世界序 [J]. 读书, 1984,(6).

[29] 柯灵. 促膝闲话锺书君 [J]. 读书, 1989,(3).

[30] 钱基博. 怎样做一个光华学生, 送毕业同学 [J]. 光华大学半月刊, 1937:5 (10).

责任编辑: 侯德彤

The Cross-generation Development Between Qian Jibo and His Son Qian Zhongshu

TAN Chun-ling

(Institute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Huazhong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Abstract: Qianjibo was a famous master of Chinese culture studies. His elder son Qian Zhongshu was a famous scholar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They chose different roads and had scored different achievements, reflecting the cross-generation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between intellectuals around the May 4 Period. The transcendence of total westernization and return to conservation is the reflection of China's merging into the world.

Key words: Qian Jibo; Qian Zhongshu; May 4; intellectual; cross-generation development

(上接第 113 页)

The Opening of Commercial Ports in Jinan and the “Benefit from Watching and Emulating” German Civilization

WANG Shou-zhong

(Department of History,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250014, China)

Abstract: In 1902, Zhou Fu, Governor of Shandong, visited Qingdao and enlightened by German management, proposed a new policy of “watching and emulating” Germans. It greatly promoted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in Jinan and became a milestone of marching towards modernization in late Qing Dynasty. Ten years of reformed became one of the periods of fast development in politics, economy and education.

Key words: benefit from watching and emulating; reform and opening; rational competition; development; modernization